

#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代际收入转移的影响： 基于 CLHLS 2005—2014 的纵贯分析

朱火云

**[摘要]** 文章借助 CLHLS 2005—2014 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DID）评估了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对三类六种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意愿和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与代际收入转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养老金一方面挤出了子女向父母转移支付的意愿和水平；另一方面具有外溢效应，增强了老年人向儿子、孙子女的收入转移，两者使约 19% 的养老金流向了子女和孙子女。同时挤出效应和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对父母与儿子、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影响明显高于对父母与女儿的影响，对低收入阶层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进一步地，随着养老金待遇的提高，挤出效应得到一定抑制，但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本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改革待遇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阶层老年人基本生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际收入转移；挤出效应；外溢效应

##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医疗卫生等多方面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但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严峻挑战，是 21 世纪国际社会正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在 20 世纪经历的两次人口生育潮，将在 21 世纪前中叶形成老龄化高峰。总体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高速、高龄、基数大、抚养比大和地区差异大的“二高三大”特征。据联合国预测，到 2020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2.56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13.3% 提升至 17.8%，老年抚养比将提高至 28%，其中高龄老人将增加至 2900 万，独居和空巢老人增加至 1.18 亿。<sup>①</sup> 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由于身体

**[作者简介]** 朱火云，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供给机制研究”（18CSH064）；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养老金促进老年融合及机制研究”（17SH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老年痴呆患者及其照料者家庭-社区综合干预研究”（SH1412）。

① 参见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2.

机能的衰退、劳动能力的丧失,老年人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同时面临着身体疾病、精神孤独等多维度贫困。如何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实现老有所养目标是摆在政府、社会及家庭面前的现实挑战。<sup>①</sup>

长期以来,家庭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依靠,其中最主要的是子女的代际收入转移。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养老金作为老年人收入来源的重要性逐步增强,占老年人收入来源的比重从2000年的19.61%上升至2010年的24.12%。<sup>②</sup>尤其是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实施以后,我国在养老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覆盖人口由2010年的3.6亿倍增至2015年的8.6亿,年均增长率为19%。<sup>③</sup>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农村居民以及城镇中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妇女、残疾人等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相比其他老年人,他们将面临更高的老年贫困风险,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但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提高是否意味着家庭作用的削弱?养老金真的有利于增加老年人收入、改善其福利水平吗?换言之,老年人是养老金制度的真正受益者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养老金制度与家庭代际收入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研究对象,详细探析其与不同代际收入转移类型之间的辩证关系,评估老年人在社会福利与家庭福利互动过程中的“损益”情况。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 (一) 文献回顾

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与私人转移支付关系的系统探讨始于Becker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理论<sup>④</sup>。他使用“社会收入”(social income,个人所赚取的收入)与“社会环境”(social environment,其他个体或组织转移给他的收入)概念,证明了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削弱了公共财政的再分配效果。在此分析框架下,围绕养老金与代际支持的关系,后来的学者采用经验数据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论证,但至今尚存在较大分歧,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挤出效应与利他主义理论,二是挤入效应与交换理论。

#### 1. 挤出效应与利他主义理论

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在有些文献中又被称之为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是指公共福利给付削弱了原有家庭的代际转移水平。早在1960年,Burgess就发现,随着战后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相继建立与发展,家庭作为历史上供养老年人的主体责任被弱

① 童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1期。

② 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③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Government of China Receiv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ward*, [https://www.issa.int/en\\_GB/web/wssf2016/news/-/asset\\_publisher/mt5ctSCSNHzW/content/government-of-china-receives-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award/10180](https://www.issa.int/en_GB/web/wssf2016/news/-/asset_publisher/mt5ctSCSNHzW/content/government-of-china-receives-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award/10180).

④ Gary Becker,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化,并逐渐转向政府与国家<sup>①</sup>。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两者的关系称之为“挤出效应”,即基于公共财政的养老金给付增强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能力,降低了对子女的依赖,弱化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行为<sup>②</sup>。如 Cox 和 Jimenez 对秘鲁的个案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给付降低了子女向父母转移额的 20%<sup>③</sup>。类似地, Amuedo-Dorantes 和 Juarez 的研究估计墨西哥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平均挤出了 37% 的家庭转移支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养老金计划的挤出效应存在性别、年龄、地区、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收入来源构成的差异。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国,墨西哥大量劳务外汇收入构成了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外汇收入较少受到挤出效应的影响<sup>④</sup>。在传统儒家文化圈,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Fan 基于台湾的“老农年金”的实证研究表明,每增加 1 美元的养老金待遇给付将减少 30—39 美分的子女转移支付<sup>⑤</sup>。Jung 等不仅证明了领取公共养老金将使家庭转移支付概率下降 40 个百分点,而且养老金并没有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sup>⑥</sup>。基于国内数据的研究普遍证实了养老金的挤出效应<sup>⑦</sup>。总之,养老金虽然理论上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养老金对家庭转移支付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实际上并未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真正受益的是老年人的子女<sup>⑧</sup>。

学者认为,利他主义理论动机是引起福利国家与家庭收入转移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理论,父代(子代)在实现自己福利最大化时会兼顾子代(父代)的福利水平。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一方面,父代对养老金的预期正向提高、福利改善,基于家庭责任与道德约束,他们则倾向于抚养子女、转移代际收入<sup>⑨</sup>;另一方面,当父代变老、子女成年后,由于福利国家向父代支付了养老金待遇,子女则会倾向减少赡养父母的意愿,削弱家庭代际的稳固性<sup>⑩</sup>。

## 2. 挤入效应与交换理论

挤入效应(crowding in effect)否定福利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负向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互利共存的,即福利国家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传统代际关系,而且促进了家庭和谐。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众多经验研究的证实。同样以墨西哥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为分析对象,Galiani 等则没有发

① Ernest Watson Burgess, *Ageing in 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3-18.

② Harald Künemund, Martin Rein, "There is More to Receiving than Needing: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Crowding in and Crowding out," *Ageing & Society*, 1999, 19(1).

③ Donald Cox, Emmauel Jimenez,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Peru,"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2, 6(1).

④ Catalina Amuedo-Dorantes, Laura Juarez, "Old-age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the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Gifts: The 70 and above Program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Mexico,"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15, 8(3).

⑤ Elliott Fan, "Who Benefits from Public Old Age Pensions? Evidence from a Targeted Progra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0, 58(2).

⑥ Haeil Jung, et al., "Do Public Pensions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2016, 15(4).

⑦ 陈华帅、曾毅:《“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焦娜:《社会养老保险会改变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吗?》,《人口研究》2016年第7期。

⑧ Donald Cox, George Jakobs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Transfers and Private Interfamily Transf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7(1).

⑨ Robert Barro,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⑩ Peter Berger,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olicy*,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ion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9, pp. 20-35.

现养老金挤出效应的证据,且认为促进了老年家庭的消费支出<sup>①</sup>;Kim对韩国公共养老金的分析表明,虽然统计模型显示出挤出效应,但回归系数在10%置信水平上不显著。即使养老金挤出了子女对父母的部分代际支持,但促进了父母对孙子女的隔代抚育<sup>②</sup>。胡宏伟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对代际经济供养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老年人,其子女的经济供养水平也随之提高<sup>③</sup>。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使用交换理论或互惠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福利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sup>④</sup>。交换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供养是对其在婴幼儿时期父母的“投资回报”或期望父母为其提供家庭劳务及孙子女的照顾服务,因此公共养老金对代际支付的影响是中性的甚至是挤入效应。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体生命周期中资源与能力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个体必须采取交换行为,即在青壮年时期存储部分剩余劳动价值以待晚年支取,家庭则是存储剩余劳动价值的“银行”<sup>⑤</sup>。年轻父母以收入转移支付的方式抚养子女,当其年老后,子女以同样方式赡养父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并不是基于利他主义动机,而是基于对其年幼时父母抚养的交换。因此,即使福利国家的发展提高了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子女的转移支付也不会因此而减少<sup>⑥</sup>。

可见,经验研究同时证明了福利国家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挤出效应与挤入效应,那么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究竟是基于利他主义动机还是交换动机呢?Cox等认为主要取决于所在国家及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文化传统<sup>⑦</sup>,但他们并没有对各国的文化特点进行划分,例如亚洲及欧美分属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其代际转移支付分别基于何种动机。Brandt和Deindl则认为与各国本身的福利体制有关<sup>⑧</sup>。Esping-Andersen的福利三分法是跨国研究最常用的分析工具。也有研究将欧洲福利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比较欧洲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如Motel-Klingebiel等利用欧亚5国数据分析发现,福利制度完善的欧洲国家促进了代际和谐,而福利家庭主义的亚洲国家则挤出了以收入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代际转移<sup>⑨</sup>。

① Sebastian Galiani, et al.,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Labour Economics*, 2016, 38.

② 参见 Erin Hye-Won Kim, *Evidence from a New Government Old-age Pension in Korea*, Duke University, 2012.

③ 胡宏伟等:《挤入还是挤出: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人口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Alan Walker, Chack-Kie Wong,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sation*,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5, pp. 3-20; Niels Schenk, et al., "The Role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ney Transfers: A Micro-level Perspective," *Ageing & Society*, 2010, 30(8).

⑤ Barbara Sarasin, et al.,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New York, Wiley, 1990, pp.173-198.

⑥ Marco Albertini,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f Time and Money in European Families: Common Patterns—Different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7, 17(4); Karsten Hank, Isabella Buber,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9, 30(1).

⑦ Donald Cox, et al., *Private Transfers in a Cross Sec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Center of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06.

⑧ Martina Brandt, Christian Deind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to Adult Children in Europe: Do Social Policies Matt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3, 75 (1).

⑨ Andreas Motel-Klingebiel, et al., "Welfare States do not Crowd out the Family: Evidence for Mixed Responsibility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Ageing & Society*, 2005, 25(6).

## （二）理论框架

在现代福利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现有研究对理解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与代际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主要集中于探讨养老金对子女向父母的向上转移支付的影响，且未考虑子女的性别差异。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福利制度下，迫切需要解释和回答如下问题：一是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养老金制度对儿子和女儿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与孙子女的隔代关系是否也受到养老金制度的影响？三是除了成年子女向老年人的“反哺型”转移支付外，老年人是否会将部分养老金收入转移给子女，即产生外溢效应？四是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完善与待遇的提高，这种影响有何变化？基于以上问题，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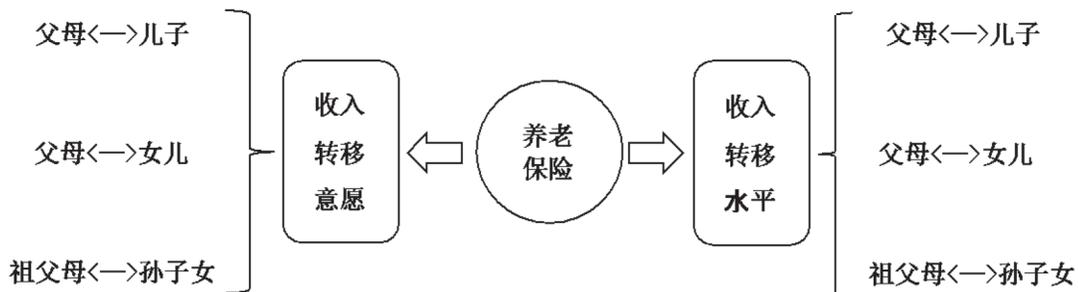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图

根据以上 4 个疑问，本文将养老保险制度对代际收入转移的影响操作化为两个维度：代际收入转移意愿和代际收入转移水平。其中，代际收入转移意愿是指社会成员向老年父母（子女或孙子女）收入转移的倾向，本文用是否实际发生代际收入转移行为来测量，与转移金额大小无关；而收入转移水平是指代际收入转移的实际金额。与现有文献不同，首先考虑到代际关系中子女性别偏好普遍存在，本文将子女拆解为儿子和女儿并进行比较；其次，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乡城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祖父母与孙子女组成的隔代共居模式的比例越来越高，隔代收入转移现象必然越来越普遍，有部分基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已表明，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将部分养老金用于其孙子女的教育、生活开支等，因此本文将祖父母与孙子女的代际收入转移也纳入分析框架；再次，现有研究普遍评估养老金对子女向父母的收入挤出（挤入）效应，而忽视老年父母对子女、孙子女的收入转移现象，本文也将这一代际转移类型纳入分析框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代际收入转移类型分为三类六种，即父母与儿子、父母与女儿、祖父母与孙子女。

##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分布

本文的数据来自由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项目（CLHLS）。该项目

的基线调查始于1998年,并分别于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以及2014年进行了为期6次的跟踪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访问了9万余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老年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日常活动能力、患病及健康状况、认知能力、经济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水平、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以及社区老年服务等,涵盖了老年人生活的各个维度。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老年调查项目一样,CLHLS数据质量之高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sup>①</sup>。2002年起,调查对象由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扩展至65岁及以上老年人。根据各期的问卷设计情况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选取2005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的4次调查数据,剔除个别65岁及以下样本,剩余样本量分别为15613、16199、9679和7107,其中2775个样本在4次调查中都被追踪访问过,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N=48598)

变量名		2005	2008	2011	2014
性别(%)	男性	42.8	42.2	44.8	45.7
	女性	57.2	57.8	55.2	54.3
年龄(岁)		86.2	87.4	86.0	85.6
居住地(%)	城市	24.8	20.5	17.9	13.9
	镇	19.8	19.5	29.7	31.0
	农村	55.4	60.0	52.4	55.2
受教育年限(年)		2.1	2.0	2.3	2.4
婚姻状况(%)	在婚	32.4	31.2	37.8	39.6
	非在婚	67.6	68.8	62.2	60.4
家庭人口数(个)		2.9	2.7	2.7	2.4
居住类型(%)	与家人共居	83.0	83.0	80.8	78.2
	独居	13.4	15.1	17.0	18.9
	在养老机构	2.7	1.9	2.2	2.9
家庭年均收入(10 <sup>3</sup> 元)		4.9	15.8	20.9	23.1

从样本分布来看,性别相对比较均衡。虽然女性样本略高于男性,但这与全国老年人口性别分布情况一致。由于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女性老年人占比也相应较高。从年龄分布来看,1998年基线调查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2002年的跟踪调查范围扩大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并从2008年起新增8个健康长寿典型地区的样本。因此,样本分布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

<sup>①</sup> 曾毅:《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1998—2012)及相关政策研究综述(上)》,《老龄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占比较高，平均年龄达到 85—88 岁，且受教育水平较低，丧偶或离异的非在婚老年人占比较高，养老需求较大。同时，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口数不足 3 人，且老年家庭收入较低、养老供给能力不足。老年人与家人共居的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是否会影响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老年人的家庭收入也逐年提高，势必影响代际转移支付关系。因此，这两个变量将作为重要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 （二）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两类共 12 个：（1）家庭收入转移的意愿：近 1 年来子女与父母是否发生收入转移支付，为二分变量，具体包括儿子、女儿、孙子女是否分别向老年人进行收入转移，以及老年人是否分别向儿子、女儿和孙子女进行收入转移；（2）家庭收入转移的水平：近 1 年来子女、孙子女与老年人发生收入转移支付的绝对金额，与第一类一样涵盖 6 个具体指标。

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本文所指称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是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所支付的养老金，以及两者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控制变量分别选取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变量。前者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分别为城市、镇和农村）等；后者则包括居住类型（分别为与家人共同、独居与在养老机构）、家庭收入。

## （三）理论模型

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于 2009 年在全国 10% 的县市进行试点，至 2012 年基本实现全国普遍实施，具有准实验特征，因此个体是否参保并不是随机的，即每个居民参保的概率并不相等，经典的 OLS 回归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选择性偏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潜在结果（potential outcome）分析框架获得广泛关注与应用，其实质在于通过构造反事实框架，计算不同个体在不同干预程度下的平均干预效应（ATT），并发展出诸如断点回归、倍差法等<sup>①</sup>。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Estimation, DID）广泛应用于特定政策干预下的面板数据和重复调查的截面数据，尤其适用于受到不可观测的事件或特征干扰的因果分析中，能有效控制内生变量的影响，估计需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准实验效果<sup>②</sup>。根据倍差法的基本原理，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别，包括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干预组，并观测到所有组别两期或两期以上的数据，其中必须涵盖政策干预前和干预后，对比控制组和干预组分别在干预前后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其数学模型如公式（1）所示：

$$T_{it} = \beta_0 + \beta_1 ROI_{it} * Time_{it} + \lambda * Z_{it}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T_{it}$  为家庭转移支付，根据变量特点，分别采用 Probit 模型（ $T_{it}$  为是否发生转移支付，是=0，否=1）和 Tobit 模型（ $T_{it}$  为转移支付的绝对金额），ROI（residents old-age insurance）

① 朱火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9 期。

②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著，郎金焕、李井奎译：《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者指南》，格致出版社，2012 年，第 159-169 页。

为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1,否=0);  $Time_{it}$  表示调查年份,为二分变量,制度实施(2009年)之前为0,制度实施后为1。 $ROI_{it} * Time_{it}$  为两者的交互项,当且仅当  $ROI_{it}$  和  $Time_{it}$  同时为1,即2009年以后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在2011和2014年参加问卷调查的样本取值为1,其余的取值为0。 $Z_{it}$  为控制变量集。

为了进一步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对代际收入转移的时间效应,即随着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这一影响是否也随之变化。我们将公式(1)进行变换,如公式(2)所示:

$$T_{it} = \beta_0 + \beta_2 ROI_{it} * Time_{it}^k + \lambda * Z_{it}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ROI_{it} * Time_{it}^k$  交互项是样本在2009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第k年的虚拟变量。如某人2009年参加养老保险,则2010年时变量  $ROI_{i2010} * Time_{i2010}^1$  为1,其余年份为0。本研究分别在制度实施后的2011年和2014年进行了调查,因此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即  $ROI * Time^1$  表示2011年为1,其余年份为0,  $ROI * time^2$  表示2014年为1,其余年份为0。

## 四、结果与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

本部分将从收入转移概率与收入转移金额两方面描述和分析样本的家庭代际收入转移现状及趋势。如图2所示,代际收入转移概率总体水平较高,但呈现显著的群体性和时间差异。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子代向父代的向上收入转移概率远高于父代向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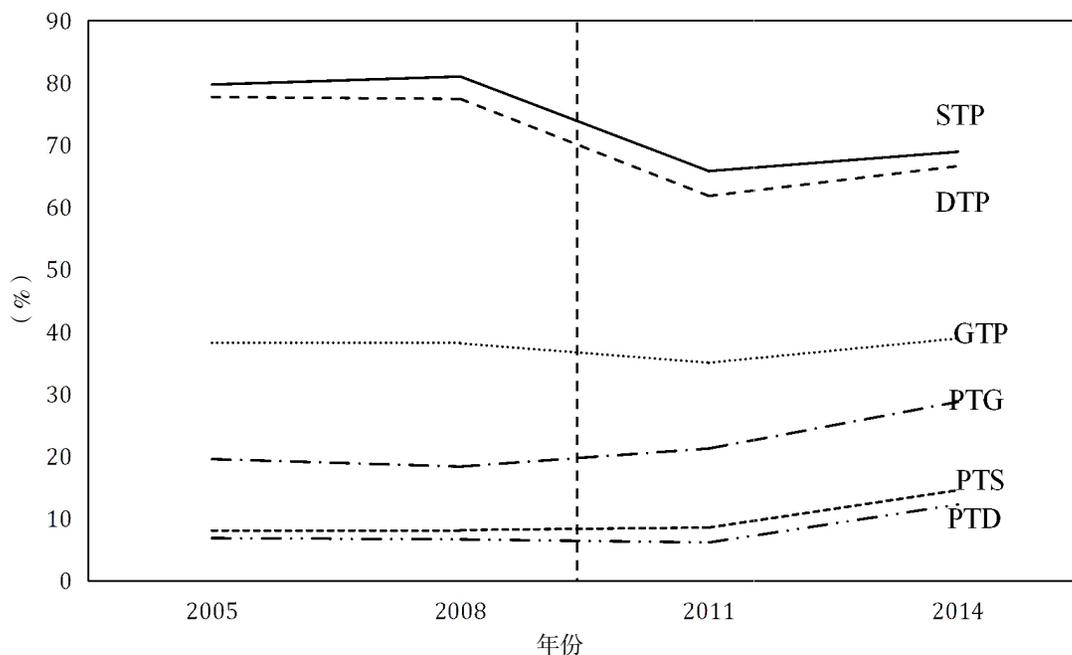


图2 2005—2014年代际收入转移概率

注: STP、DTP、GTP、PTS、PTD、PTG 分别表示儿子向父母的转移支付、女儿向父母的转移支付、孙子女向祖父母的转移支付、父母向儿子的转移支付、父母向女儿的转移支付、祖父母向孙子女的转移支付,图3相同。

的向下收入转移概率，表明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同代人间的性别差异不明显，儿子的转移支付略高于女儿，但同代与隔代间的差异显著，孙代向祖代的转移支付概率远低于子代。然而，父代向子代的向下收入转移在同代与隔代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特点，即祖父母给孙子女的收入转移概率要明显高于其子女，反映出代际收入转移间的非对等不平衡性的特点。换言之，向上的代际转移关系跨度较短，集中于子代与父代之间；向下的代际转移关系跨度较长，将代际转移关系延长至孙代。这可能既是传统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当前家庭结构现实的反映，即年轻子女外出务工，老年人与其孙子女共同组成隔代居住模式。

从时间上来看，向上的代际转移与向下的代际转移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在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在图 2 中表现为 2008 年以后），向上的代际转移概率明显下降，相反向下的代际转移显著上升，初步表明城乡居民养老金对子代向父代的转移支付产生了挤出效应，相对应父代向子代的转移支付产生了溢出效应，但是否是由于抽样误差导致，后文将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确定。

图 3 为 2005—2014 年代际收入转移绝对金额的变化趋势，与转移支付概率的群体差异不同，六类收入转移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各群体的增长率有所不同。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前，实施后各类代际收入转移都呈现明显的跳跃式增长。图中表现为 2008 年和 2011 年间折线的斜率显著增大，表明无论是向上代际转移还是向下代际转移，可能皆受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影响。换言之，就转移金额而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对子代向父代的收入转移产生了挤入效应，而对父代向子代的收入转移产生了外溢效应，后文的模型分析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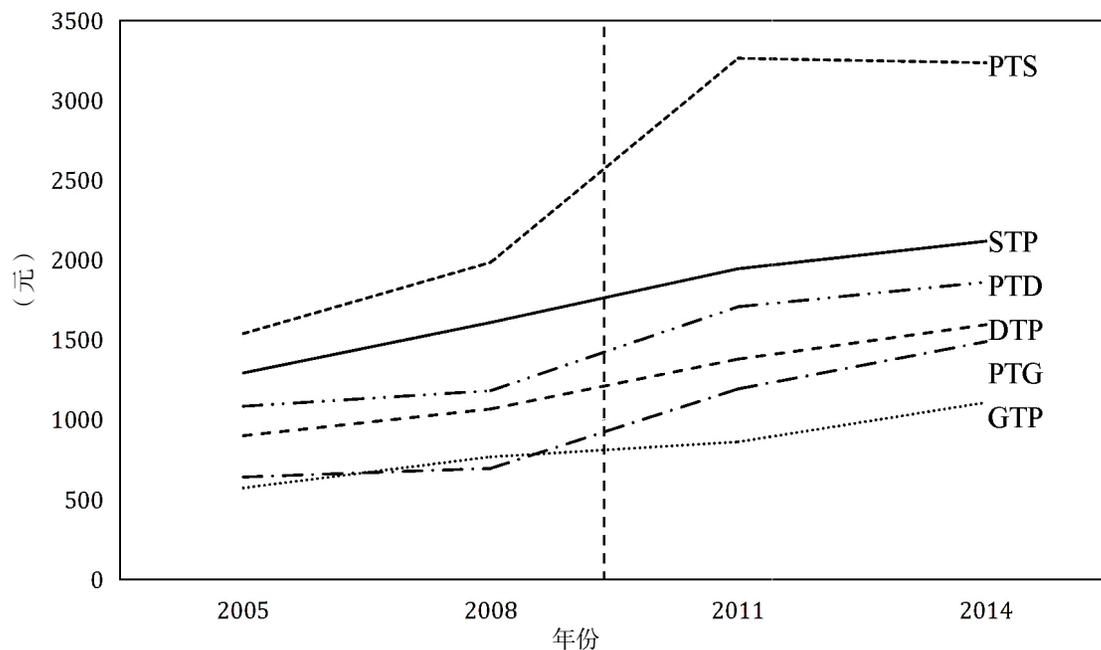


图 3 2005—2014 年代际收入转移金额

以上分析表明,就收入转移金额而言,养老金并没有对子女向父母的转移支付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对父母向子女的转移支付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那么,真正受益者是老年人还是其子女?

如果说代际转移概率具有显著的方向性差异,那么代际转移金额则呈现明显的性别特征和代际特征。依据金额大小,代际转移依次为儿子与父母、女儿与父母、孙子女与祖父母三类。此外,相较于2009年以前,父母与儿子、父母与女儿、祖父母与孙子女三类收入转移差额在2009年后都明显扩大,进一步证明了养老金对向下的代际转移产生了外溢效应。其中,父母向儿子的收入转移金额在所有类别当中最高,从2005年的1500元/年增长至2014年的3261元/年,虽然相较于2011年,2014年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类型。另外,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双向收入转移金额在2009年以前基本相同,但在2009年以后,祖父母向孙子女的转移要显著高于孙子女向祖父母的转移额。

## (二) 模型结果

### 1. 养老金对代际收入转移的综合效应

首先来看养老金对子代、孙代向父代收入转移的影响(如表2所示),Probit和Tobit模型分别以收入转移概率、绝对金额为因变量,两类模型中的自变量及控制变量保持一致。就代际收入转移的概率而言,养老金明显降低了儿子、女儿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概率,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养老金降低了子女向父母转移支付的意愿,对儿子和女儿分别降低了25%和26%。尽管以交换理论为基础的“反哺模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但这一模式是在其他主体(如政府)缺失的背景下运行的。当国家作为养老保障的直接责任主体嵌入到传统家庭结构当中时,“反哺模式”必将受到影响。孙子女向祖父母的收入转移意愿并未受到养老金制度的影响,转移支付的动机基于自身的经济能力,而非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与福利水平。无论从转移意愿还是实际金额上,孙子女向祖父母的收入转移都是较低的。

表2 养老金对子代、孙代向父代转移支付的影响

	儿子→父母		女儿→父母		孙子女→祖父母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ROI*Time	-.247***	-239.88***	-.256***	-131.48***	.019	77.00*
男性	-.059***	-122.86***	-.059***	-91.20***	-.127***	-209.98***
年龄	-.003***	1.56	-.008***	-5.60***	.033***	57.68***
在婚	-.013	312.12***	-.030	135.43***	-.195***	-252.70***
独居 <sup>1</sup>	.001	264.06***	-.011	166.01***	-.041**	60.22
养老院	-.512***	234.09	-.470***	192.41*	-.338***	-136.01
镇 <sup>2</sup>	.157***	-108.22**	.052**	-510.77***	.240***	236.61***

	儿子→父母		女儿→父母		孙子女→祖父母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农村	.338***	-.911	.212***	-469.78***	.306***	271.24***
家庭收入	-.004***	15.09***	-.004***	10.06***	.003***	11.63***
样本量	35625		34297		37121	

注：1. 居住模式以与家人共居为参照组；2. 居住地类型以城市为参照组；3.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以收入转移金额为因变量的 Tobit 模型则表明，城乡居民养老金明显减少了子女向老年父母的收入给付，其中儿子被挤出的额度较高于女儿，两者分别为 240 元/年和 131 元/年。根据问卷计算，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平均为 395 元/月。据此计算的养老金对儿子和女儿的代际收入转移挤出率分别为 5% 和 3%，挤出效应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影响有限。与子女向父母的实际转移支付额相比，这一比例仍然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收入转移概率不显著，但养老金对孙子女向祖父母的实际转移金额的挤入效应具有统计性显著，然而挤入力度同样有限，仅为 77 元/年。

结合收入转移的意愿与水平两方面可以发现：养老金同时降低了子女向父母转移支付的意愿和实际金额。但这一影响是否同时作用于所有社会阶层？本文进一步以问卷中样本“生活状况在当地的水平”5 分定序变量为分层变量，比较城乡居民养老金制度实施前后代际转移意愿的变化，发现生活水平越高，制度实施后子女向父母收入转移意愿的下降幅度越小，反之，生活水平越低，制度实施后子女向父母转移意愿的下降幅度越大。例如，最富裕和最贫困的两组样本，制度实施前儿子向父母收入转移概率分别为 74% 和 69%，制度实施后分别为 70% 和 48%；相反，两组样本的实际转移额在实施前分别 1904 元/年和 662 元/年，实施后前者上升至 2336 元/年，后者则下降至 543 元/年。女儿也呈现相同趋势。因此，中低收入阶层的老年人是养老金挤出效应的主要作用群体，相对于中高收入阶层，养老金制度的挤出效应置他们于更不利位置。

表 3 与表 2 的模型结构基本类似，因变量为老年人向子女、孙子女的收入转移概率和绝对金额，反映了养老金对父代向子代、祖代向孙代转移支付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对老年人向子代、孙代的转移支付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不论是转移支付意愿，还是金额，养老金对儿子和孙子女皆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有效促进了老年人向其儿子、孙子女的代际转移。但老年人不仅没有增加对女儿的转移支付，相反降低了支付意愿和金额，尽管统计上不显著。很明显，具有传统思想的老年人认为，只有儿子是“香火”延续的唯一载体，而孙子女则是所延续的“香火”。可以说“养儿防老”描绘的是父母在年轻时用抚养子女以换取在其年老后子女的赡养，是一种典型的交换主义模式，但老年父母向子女转移部分养老金显然无法用此理论解释。尤其是孙代，老年人并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资金和服务等方面的

养老支持。而利他主义理论更能解释这种外溢效应，即养老金使老年人的福利得以改善，基于家庭责任与道德约束，他们则倾向于向儿子和孙子女转移收入，是年轻父母抚养子女行为的一种延续。

表3 养老金对父代向子代、孙代转移支付的影响

	父母→儿子		父母→女儿		祖父母→孙子女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ROI*Time	.054*	492.71***	-.025	-82.38	.088***	203.60***
男性	.118***	827.89***	.059***	274.32***	.091***	198.77***
年龄	-.010***	-56.32***	-.009***	-33.19***	-.022***	-37.00***
在婚	.067**	629.18***	.120***	510.44***	.110***	278.25***
独居 <sup>1</sup>	-.038	-38.52	.050	209.32	.006	107.22**
养老院	-.230**	-1326.81*	-.108	-408.31	-.373***	-584.14***
镇 <sup>2</sup>	-.190***	-1215.24***	-.197***	-909.67***	-.121***	-396.49***
农村	-.180***	-1330.14***	-.161***	-871.33***	-.230***	-633.48***
家庭收入	.008***	57.41***	.007***	31.68***	.010***	23.20***
样本量	34522		33402		36693	

注：1. 居住模式中中与家人共居为参照组；2. 居住地类型以城市为参照组；3.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平均而言，养老金对老年人向儿子、孙子女收入转移的外溢力度分别为 492 元/年和 204 元/年，外溢率分别为 10% 和 4%。结合挤出效应与外溢效应，养老金共挤出了 908 元/年代际转移，占养老金的 19%。换言之，就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水平而言，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中有近 1/5 通过多种代际转移的方式流向了其子女和孙子女，他们与老年人共同组成了养老金制度的受益者，但老年人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 2. 养老金对代际收入转移的时间效应

表 4 是以  $ROI*Time^1$  和  $ROI*Time^2$  为解释变量对六种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概率和绝对金额进行回归的结果，为使图表简洁，省略了所有控制变量。根据本数据库的样本计算，2011 年和 2014 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标准分别为 245 元/月和 436 元/月，养老金待遇水平显著提高。养老金制度对子女转移支付的挤出效应是否会随之增强？养老金的溢出效应是否也会随之增强？表 4 的结果表明，养老金待遇水平与代际转移支付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一方面，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削弱了儿子向父母的转移支付意愿，而增强了女儿向父母的支付意愿，但没有显著影响给付金额。就孙子女而言，养老金水平增强了其对祖父母的给付，由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转变为显著的挤入效应，且对给付金额也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养老金待遇的提高增

强了老年人向子女、孙子女的外溢效应，给付意愿和金额都显著提高。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4 年养老金对老年人向儿子转移支付的外溢效应达到 1388 元/年，远高于 2011 年的负向影响，养老金待遇增长了 2292 元/年，超过一半增长的养老金转移给了儿子。因此，随着养老金待遇的提高，挤出效应得到有效抑制，而外溢效应进一步强化。

表 4 养老金对代际收入转移的时间效应

	儿子→父母		女儿→父母		孙子女→祖父母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ROI*Time <sup>1</sup>	-.243***	-332.45***	-.285***	-266.03***	-.013	-58.68
ROI*Time <sup>2</sup>	-.253***	-117.89	-.217***	48.66	.063*	252.37***
	父母→儿子		父母→女儿		祖父母→孙子女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ROI*Time <sup>1</sup>	-.058	-281.55	-.150***	-617.77***	.001	13.90
ROI*Time <sup>2</sup>	.188***	1387.52***	.123***	525.56***	.204***	445.62***

注：1. 控制变量省略；2. \* 表示 p<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五、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只考察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代际收入转移的影响。但现实中，除了这一政策之外，经济、社会和家庭政策也可能导致代际收入转移的变化，而这些政策与养老保险政策无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排除无关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中通常采用引入滞后项或提前项构建反事实框架的平行趋势检验的方法。本研究中，2009 年是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实施的实际年份，假定该政策提前至 2005 年，如果样本观测值分别是 2005 年和 2008 年的数据，则新增变量 B2005、B2008 均为 1，其余为 0，同时，假定政策延后至 2014 年实施，则新增变量 A2014 取值为 1，其余均取值为 0。由于该政策虽然在 2009 年实施，但在 2012 年前未实现制度全覆盖，因此 2011 年不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平行性检验年份。由此引入了 3 个时间虚拟变量：B2005、B2008、A2014，分别代表假定该政策提前 4 年、1 年或延后 5 年实施。以实际转移支付额为因变量进行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除孙子女向祖父母的转移支付外，其他五类代际转移在政策发生实施之前都不具有统计性显著，而在政策实施后均显著，且回归系数变化趋势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一致。这表明双重差分的回归系数是无偏的，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确实对代际收入转移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而言，养老金挤出了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而溢出了父母向儿子、孙子女的转移支付。但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对孙子女向祖父母转移支付的影响并未得到确认。

表5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儿子→ 父母	女儿→ 父母	孙子女→ 祖父母	父母→ 儿子	父母→ 女儿	祖父母→ 孙子女
B2005	62.55	-20.73	96.18	-26.36	41.50	52.13
B2008	211.68	112.21	243.62 <sup>***</sup>	7.09	38.40	72.96
A2014	-335.93 <sup>*</sup>	-278.46 <sup>***</sup>	295.29 <sup>***</sup>	226.3 <sup>*</sup>	182.53 <sup>**</sup>	381.77 <sup>***</sup>

注：1. 控制变量省略；2. <sup>\*</sup>表示  $p < 0.1$ ，<sup>\*\*</sup>表示  $p < 0.05$ ，<sup>\*\*\*</sup>表示  $p < 0.01$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由于身体、精神的衰退，人们在步入老年后将逐步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与此相伴随的是收入中断、健康医疗支出增加、精神的孤独。<sup>①</sup>长期以来，家庭扮演着赡养老年人的主要角色，子女的代际转移支付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国家和政府通过养老保险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了部分收入支持。尤其是200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养老金维持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sup>②</sup>那么，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提高是否意味着家庭作用的下降？即养老金给付是否会对家庭代际收入转移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使老年人的净福利受损，而使子女成为养老金的最终受益者？或者更为一般地，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非正式的代际支持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借助CLHLS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代际收入支持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复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1）养老金降低了子女向父母转移支付的意愿，挤出了转移的金额，且对儿子的挤出效应略高于女儿。虽然我国传统代际关系具有“反哺型”特征，子代向年老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不仅是对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具有孝道文化的软约束，但这些都是其他供养主体缺失背景下的行为表现，当政府作为外生变量嵌入其中时，原有代际关系受到影响。（2）养老金增强了老年人向其儿子、孙子女的转移支付意愿和水平，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但对女儿的转移支付无显著影响。养老金对老年人向子代、孙代转移支付的影响再次证明了我国代际关系中的性别特征，即男性在代际关系中的排他性地位。综合考虑挤出效应和外溢效应，19%的养老金通过多种代际转移的方式流向了其子女及孙子女。（3）随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待遇水平的提高，养老金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削弱了挤出效应，强化了外溢效应，总体上进一步加大了老年人向子女的净转移支付额，但现有制度下老年人仍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提高其预防老年风险、

① 王杰秀、安超：《全球老龄化：事实、影响与政策因应》，《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4期。

② 贾玉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反贫困及未来攻坚展望》，《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1期。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促进代际和谐关系的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1）应充分认识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受益者不仅是老年人，而是包括其子女、孙子女在内的整个家庭，该制度提高了家庭的福利水平，促进了家庭代际互动与和谐。虽然挤出效应和外溢效应使部分养老金待遇流向了家庭其他成员，但老年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的事实没有改变。（2）科学评估养老金政策对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扰动”机制，为进一步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待遇调整机制提供科学参考。（3）养老保险制度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收入转移的差异化影响值得进一步分析和关注，以更好地保障低收入老年人权益，提高其福利水平。

## Effects of the Residents Old-age Insura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ased on CLHLS 2005–2014

Zhu Huoyun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data of CLHLS 2005-2014,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Residents Pension Scheme on six categories in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with the method of DID. Results show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ns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n the one hand, pensions crowd out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on the other hand, pensions crowd in transfers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combined effects resulted in a reduction of 19 percent of pensions for the older people. Meanwhile, the crowding-in and crowding-out effects differ among gender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Effects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s and sons,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re much stronger than those between parents and daughters, and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n low-income group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high-income groups. Furthermore, with the increase of pension, the crowding-out effect weakens and the crowding-in effect is enhanced.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nsion schem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reforming the mechanism for adjustment pension benefits and guaranteeing the basic livelihood of the low-income elders.

**Key words:** Residents Pension Scheme;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crowding-in effect; crowding-out effect

(责任编辑：杨建敏)